

笑 冬 著

# 站在**国家**与**男人**之间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性别推动力

馆

中国物资出版社

# 站在国家与男人之间

——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性别推动力

笑 冬 著

中国物资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站在国家与男人之间: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性别推动力/  
笑冬著. —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2. 8

ISBN 7-5047-1789-4

I. 站… II. 笑… III. 农村-妇女-研究-中国  
IV. D669. 6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2568 号

中国物资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http://www.clph.com.cn>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 25 号

电话:(010)68392746 邮编:100834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利森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mm 1/32 印张:8.375 字数:210千字

2002年8月第1版 2002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47-1789-4/F·0644

印数:0001—1000册

定价:16.00元

(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关于一个女人的庙 .....	(1)
题目与主旨 .....	(3)
理论框架 .....	(7)
• 前人的研究 .....	(7)
• 我的理论框架 .....	(11)
调查方法 .....	(14)
第二章 一个基本的看法:妇女与农村工业化 .....	(22)
妇女与工业积累和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 .....	(25)
• 人民公社的建立 .....	(28)
• 统购统销的实行 .....	(32)
• 城乡二元化的壁垒 .....	(34)
妇女与两种工业化体制:走向工业化与城市化的 两条道路 .....	(45)
妇女和社区劳动力市场 .....	(53)
第三章 乡镇企业发展中性别化的亲属角色 .....	(63)
性别化的亲属角色和村工业的崛起 .....	(63)
社区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	(75)
劳动的性别分工:工作与家庭 .....	(91)
结束语 .....	(103)
第四章 本地人和外地人:社区劳动力市场中的 外地女工 .....	(105)
外地女工和社区劳动力市场 .....	(106)

· 外地农业专业户的进入·····	(106)
· 外地工业工人的进入·····	(109)
· 建立在亲属关系、居民身份和性别上的劳动分工·····	(111)
生活在他的外地女工·····	(121)
· 两难困境:对待外地劳动力就业的矛盾政策·····	(121)
· 农村工业积累:谁来付出代价·····	(124)
· “本地人”和“外地人”:外地妇女的文化束缚·····	(126)
· 外地女工的反抗:争取自己的权利·····	(134)
结束语·····	(139)
<b>第五章 妇女与新的社区权力结构</b> ·····	(142)
八十年代权力结构的建立·····	(142)
工业所有制改革和权力关系变化中的妇女·····	(147)
· 1994年的第一次所有制改革·····	(147)
· 1997年的第二次所有制改革·····	(155)
妇女与社区发展·····	(160)
结束语·····	(168)
<b>第六章 最后的一代传统婆婆</b> ·····	(170)
从传统的家族制度看婆媳关系的实质·····	(171)
从分家看婆媳关系的实质·····	(176)
家庭资源控制权的转移:媳妇如何占了上风?·····	(180)
彩礼和嫁妆的再建构:女儿的地位,婚姻和妇女的生育·····	(191)
养老模式的改变:最后的一代传统婆婆·····	(204)
后记·····	(219)
附:参考文献·····	(233)
调查问卷·····	(249)

## 第一章 导言：关于一个女人的庙

以什么方式进入调查地点是每一个调查者都要想的事情。1993年夏天，我在美国学习五年后，第一次回国做博士论文的调查准备工作。过去当记者时的网络搁置多年，找不到合适的人帮我在苏南沿海一带联系。我又不愿意挂靠某个单位拿着官方介绍信下去，因为这不符我的实际身份。最后，我托亲戚请解放日报的记者给无锡县委打了个电话，就说有个留学生想了解乡镇企业和农村妇女的情况，麻烦帮着找一个合适的村子。

我拿着简单的行李独自一人到了无锡火车站。县委宣传部的一个同志判断我就是他要接的人，上前打了个招呼，简单寒暄了几句，就说：“我直接把你送到村子里。”我心中暗想，到底是无锡，讲究效率，没有那么多应酬。在车上，他告诉我，无锡县共有584个行政村，我要去的那个村在工业发展、家庭收入和政府领导力度三方面均属于中等偏上的水平。这是我事先就说好的关于所调查村的基本条件。

“这个村叫什么名字？”我这才抽出空儿来问这个问题。

“姑亭庙。”

“这名字是关于一个女人的吗？”

“是的。”于是，我听到了一个发生在一千多年以前的传说。后来，我住在这个村里时，至少又听人讲了五、六遍这个故事，版本略有不同，但我总是听不够。

根据人们所说的时间，这个故事大约是发生在五代十国，公元907到960年间。当年这一带常有战争，十里修一亭，据说是歇脚和军事上传递信件用的。有这么一天，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到地里

去给正在劳动的丈夫送饭。走到一处亭子，发现有个将军受伤倒在那里。这将军对妇人说，他几天没有吃饭了，能不能救他一命。那妇人就把饭给了他。傍晚丈夫回家，向母亲抱怨妻子没有送饭。母亲觉得不对，就把媳妇叫来质问。媳妇说了实话，公婆丈夫都不信，说她不清白。这妇人为证明自己无辜，就上吊自杀了。若干年后，将军在京城做了官，不忘救命之恩，重返旧地寻找恩人，才得知妇人已因他之故冤死了。于是将军为她修了一个庙。庙里的神像是个妇女，下面还有一行刻字，称“女大王”。从此这个庙成了当地百姓敬香拜佛的地方。到了文化大革命，神像和庙都被毁了。这以后发生的事情就更神了，按照村里人的说法，文革中参与毁神像的男人大都没有好报应，不是自杀就是得了精神病。

自从1993年我听了这个故事，它就常常萦绕在我的脑子里。我总觉得这个故事对我有重大的启示，可就是表达不出来。就这样拖了四年，随着我调查的深入和认识的更新，我才忽然领悟到，我之所以感到很难将这个故事对我的启示概括出来，是因为它包含着两套高度抽象、相互矛盾，同时又并行不悖、合二而一的价值体系。而这两套价值体系又这么典型地概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男性对女性的判断和评价。在这个故事中，两个男人对这个女人完全不同的判断和评价是根据她所做的同一件事情。在丈夫的眼里，这女人道德低下，因为她不守妇道；在将军的眼睛里，这女人非常高尚，因为她深明大义，舍己救人。为此，她被前者惩罚，被后者敬重。很明显，她的死是因为被夹在两个由男性社会所设置的、互相冲突的道德评价系统之中：对家庭的忠诚和对社会大义的敬奉。她的自杀成全了这两个男人，帮助这个由男人统治的社会延续了这两套既矛盾又合一的价值体系。

这个故事辩证地表达了中国传统文化和意识形态在性别问题上的观念。凭籍这个故事所引发的灵感，我试图建立了一个理论框架来研究我所调查的题目：变革时期的农村妇女，中国农村工业化的性别推动力。

## 题目与主旨

我调查的主题是农村社会性别关系与乡镇企业发展的相互作用及影响。农村工业化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本书不是讲这个发展的物质方面，诸如资金积累、开拓市场等，而是讲“人”作为这一发展的推动力。这也不是讲人如何奋发图强，而是研究人的不同群体之间的社会差别，以何种方式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市场机制相结合，从而推动了经济的发展。而这种发展又如何将社会差别演进到了一种新的形态。

人类社会的不平等主要可以归入三大范畴：阶级的，种族的，和性别的。它们概括了人类社会最主要的、延续时间最长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之所以能够延续，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可以被利用来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市场经济最富有生机，同时又常常是十分冷酷的机制之一，就是顽强地寻找廉价劳动力：付低工资，赚高利润。谁最有可能成为理想的廉价劳动力呢？那就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穷人、农村人、妇女、少数族裔和第三世界的老百姓。但是，压低劳动力价格和推动经济发展并不总是成正比，常常成反比，而且是具有破坏性的。市场萧条可能是由于生产不足，就像 60 年代的中国和前苏联，货架上商品有限，甚至是空的。其主要原因不在消费生产能力上，而是投资重点过于偏倚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市场萧条也可能是由于生产过剩。所谓生产过剩并不真的是商品多得消费不掉，而是消费者购买力不足。劳动者工资低，无力购买商品，导致经济增长停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 20 年代末及后来历次的大萧条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从而创造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实践。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也有痛切的教训，尽管形式不同，但道理是相通的。重要原因之一，用简单的政治经济学语言讲，就是没有解决好积累与消费、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用社



会学的语言讲,是没有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相对协调平衡。

把性别不平等并列于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性别的不平等牵涉到世界一半的人口,而且比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复杂得多,因而深化了我们对不平等的理解。我想通过三个方面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现在很少有人公开说:某某民族是天生的劣等民族。但说“女人生来就不如男人”,“养孩子、做家务是女人的天职”的还大有人在。原因之一是因为男人和女人在生理上确实存在差别。但这种生理差别,诸如体力、耐力、思维能力等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究竟有多大,更重要的是,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化和内化的结果,大多数男人一般不会去考虑,大多数女人也说不清。内化的意思是说,当事人把社会对自己的评价和认定全盘接受下来,变成了自己对自己的评价和认定。

第二,性别不平等无法与男女的亲密关系(爱情和性)以及共同生活的基本依托(家庭)分开。下层阶级和弱势民族对不平等会有强烈的感受和抗争,但性别不平等不一定导致类似的结果。一个傍大款的年轻女人可能自我感觉很幸福,尽管别人把她定义为没有名分的“包二奶”。一个经常挨打的农村妇女对丈夫的赌博、酗酒很不满,但她还是要和这个男人厮守一生。

第三,社会对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的重视远远超过对性别不平等的重视,因为后者不会引起大的社会动荡。前两者则不同,贫富差别太大,失业工人太多,少数民族上街游行,政府就会紧张,就要想办法解决问题。而妇女作为社会群体很少为性别不平等采取激烈的社会行动。这首先要“归功”于“家庭”这一社会设置(social institution)。也就是说,女人有退路,家庭这个“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被看成主要是女人的领地。丢了工作就回家,让男人养。女人通过家庭被个体化了,被隔离了。男人则不同,男人不在“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里占个位置,即起码有一个正式的工作,就不被看成是真正的男人,这同样是社会化和内化的结果。同时,众多

男人在公共领域占有位置有利于男人为消除阶级和种族的而不平等而联合起来，因为公共领域被看成是进行社会和政治活动的地方。

性别的不平等被提到社会的议事日程上远远晚于阶级和种族的而不平等，但它终于被提出来了。这是因为十七、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创造了全新的生产方式：家庭不再是生产和生活合一的单位。生产功能从家庭中被剥离出来，全面进入了公共领域。不但男人，妇女和儿童也被推进公共领域充当雇佣劳动力。在英国早期纺织工业发展过程中，妇女和儿童被大量雇佣，作为压低劳动力市场价格的砝码(Hartmann1976)。从60年代到90年代的今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成本的逐渐昂贵使他们把眼光转向了第三世界。这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原始动力之一。大量使用第三世界妇女的廉价劳动力就是其中的一个结果。同时，当妇女走进了公共领域以后，性别的不平等就从隐性(invisible)、个性的，变成了显性(visible)、社会性的了。作一个简单的总结：性别就和阶级、种族一样，其不平等可以被利用来作为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而不平等的深化又迫使人们起来抗争，使经济发展和社会平等达到一个新的相对平衡。这就是我所说的“性别推动力”的一般性的意思。

什么是“性别推动力”的特殊性呢？这是指它在中国工业化的特定条件下的个性表现。例如，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工业化进程造就了两个有巨大差别的社会群体：城里人和农村人，对妇女来讲就是城市妇女和农村妇女。这两个群体的差别之大就如同阶级差别，生活在城市和农村就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可是，当我们不无自豪地说中国妇女如何解放，如何与男人同为半边天时，其实是在指城市妇女。可城市妇女只占中国妇女的五分之一强。这种差别是建立在农民为城市工业化积累所作出的巨大牺牲之上：不许分享城市工业资源，对国家的农产品收购价格没有发言权，被迫接受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有限地发展农村手工业和工业。

70年代以来的农村生产责任制和乡镇企业的发展从相当大的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农村工业化第一次成为有实在意义的、

激动人心的词汇。就像有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乡镇企业的发展就像“一夜之间出现的奇迹”(Byrd & Lin, 1990)。这是我最初要研究这个题目的动力。关于“性别推动力”的个性表现，我是从三个角度来看的。

第一，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不可能重复西方早期的工业发展道路，因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不同了。自从殖民主义和替代殖民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以来，原生资本主义(proto-capitalism)已经不会在第三世界国家出现了。而西方资本主义对80年代初的中国的影响还远不像现在这样明显。就早期乡镇企业的发展而言，它所需要对付的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而是和城市工业资源的关系，以及如何在市场上争得一席之地的问题。由于工业市场被城市所统治，城市工业资源又被各级政府部门所控制，国家和农民的关系成了早期乡镇企业发展的关键。农村妇女是融在“农民”这个大范畴里起作用并受到影响的。

第二，很多研究中国乡镇企业的专著和文章都谈到血地缘关系对农村工业发展正负两方面的重要影响，当然主要是从经济发展角度谈的。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对阐明性别的社会关系至为关键。我们过去对旧中国的宗法社会有很多批判，那是因为“阶级”这个要素在宗法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位置被看得非常突出。构成旧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要素有四个：阶级、家族、辈分和性别。也就是说，经济实力最强、家族支系最大、辈分最高的男性，最有可能获得权力。传统的婚姻是父系制和从夫居，女人出嫁后是外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在政治权力中占有位置。虽然她们也在丈夫的家族和村子里受到保护和分享生活资料，但前提是尽到了为人妻，做人母的“责任”。这个责任是由男性社会来定义，女人自己来内化的。五十年代以来的城乡二元化体制弊端很多，但有一个结果，后来反而成了乡镇企业发展的重要基础，那就是保留了相对完整，没有被城市工业化侵蚀过的血缘亲族的联系和纽带，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以村落为单位的社区。这种社区和社区意识在二十多

年人民公社的实践中被强化了。从文化人类学的眼光来看，以血缘亲族为纽带的群体是人类社会最早的形式，其共同利益和群体意识、社区意识都最为明显。当然，最早的社会分化也是从这里开始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改变了这种社会联系的格局，人们每天更多的是和没有亲缘关系、但有利害关系的人，或者和陌生人打交道。可以说，以血地缘为纽带的社区是前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在工业化和城市化都相对发展的 80 年代的中国，仍然存在着极为众多的以血地缘为基础的社区，而且它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成为乡镇企业迅速发展的基地，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对其刮目相看，重新审视了。农村妇女确实是生活在身份、角色、秩序分明的家族圈子里，但同时也生活在社区中。她们和男性农民的利益、和社区利益有密切的关系。用一句明了的话来说，雇一个本村的妇女并不仅仅是雇了一个劳动力。在厂长的眼睛里，她还是某人的妻子、母亲、婶子、妯娌。厂长不能完全不在乎这些关系。

## 理论框架

### 前人的研究

中国农民中妇女占一半。那么，改革开放后农民地位的提高和实力的增长是不是说明了农村妇女在这些方面也有了同等程度的变化呢？事实上，农民的实力并不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妇女，因为政治和经济的实力总是分层的和性别化的。在提出我自己的理论框架之前，先讨论西方学者对当代中国农民问题和妇女问题的四种理论。我把这四种理论归纳为：1. 国家与农民；2. 国家与村社；3. 社会主义与父权制；4. 国家与妇女。

Kelliher 的《中国农民的力量》(Peasant Power in China, 1992)一书代表了第一种理论。该书探讨了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国家”非常强大、“民间社会”十分弱小的国度里，农民对政治和社会

的改革会有如此显著的影响力,并因此改变了国家和农民的权力关系。这里,他借用了—个非常重要、近年来在国内也引起讨论的国家与民间社会的理论(state-society perspective)。该理论认为,民间社会是一个不被国家权力直接控制的、各阶层百姓自行从事非官方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的社会领域。其存在的重要性之一是能够使老百姓对国家不合理的、过分的要求和控制有抗争的余地(Huang 1985, 1993; Rowe, 1990; Wakeman, 1991, 1993; Perry, 1994)。Kelliher 指出,中国的问题正是在于国家的权力太大,对民间社会干预过多。例如人民公社时期,除了国家所规定和认可的组织形式和准则,中国农民没有其他选择,所以农民的地位非常弱小和低下。但同时,由于国家把—个巨大数量的农民置于相同的地位和单一的社会阶级,这使得“阶级”成为—个比资本主义多种形式的阶级更突出的社会存在,也因此造成了大众行动的可能性。Kelliher 也看到了经济改革以后的变化。当农村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群体——企业家,农民就不再是—元化的阶级了。他指出,国家很可能依赖这个企业家群体来使农村的发展朝着国家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是 Kelliher 并没有更进一步地告诉我们,在什么情况下,阶级的划分不再主要是国家和农民之间,而是在农民之中呢?农民企业家是否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农民的整体利益和实力,还是只代表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判断这个分界的根据是什么?如果农村中的社会分化是朝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那么,在与国家的关系中,农民的实力又如何被衡量和解释呢?这些变化都对性别问题有重要影响。

Kelliher 的不足之处还在于他没有说明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具体联系和运作,也没有详细说明哪些人在实际上代表了国家和农民来进行这种运作。他关于“国家”和“农民”的概念往往比较抽象。这个弱点在 Oi 的著作里得到了弥补。

Oi 的国家和村社理论把“村”看成是国家和民间社会相遇的—个交叉点,是进行政治运作的实际地方。在她的《当代中国的国

家与农民》(State and Peasa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1989)一书中,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具体的联系是由地方干部作为国家代理人来完成的。但就村一级的干部来说,他们是一个特别的群体。他们既代表本村民的利益,又代表自己的利益。而他们自己的利益和中央政府的利益并不等同。Oi并不认为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只是简单的强者对弱者。她把这种关系比作是一个“老板和顾客的体制”(a clientelist system)。这种体制最初用来类比地主和雇农的关系,是Scott著名的“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理论中论述的(1976)。该理论的中心思想是,在国家与农民、地主与农民的关系中有一个道德底线,即给农民留下的粮食能够使农民活下去。符合这一原则的就是“道德经济”,超过了这个界限农民就要造反。换句话说,检验这个制度是不是剥削的,主要看“多少粮食剩下来”而不是看“多少粮食被拿走了”(Scott, 1976: 7)。Oi没有简单地用“老板和顾客的体制”来套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和农民的关系,而是认为这个理论最适合说明村里的政治学。她说,“老板和顾客的体制”不同于解放前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因为,第一,人民公社时期,大队干部、生产队长、社员有着相似的社会和经济地位;第二,在集体化的劳动制度下,农民的基本口粮原则上能够得到保证,即使劳力少、人口多,工分不够的家庭也不例外。这使得村里的农民可以通过和生产队长的个人关系,即顾客与老板的关系,来保护自己的利益。生产队长和大队以及公社干部的关系也可以依此类推。这就创造了一种可能性,即普通农民和村干部联合起来对付国家的高征粮政策。向政府隐瞒实际产量是人民公社时期村干部普遍使用的生存手段,并被农民广泛支持。

社会主义与父权制理论(socialism-patriarchy paradigm)是一些西方学者共同建立的(Stacey, 1983; Wolf, 1985; Croll, 1978; Johnson, 1983; Diamond, 1975)。该思想的主要代表者是Judith Stacey,她所写的《中国的父权制和社会主义革命》(Patriarchy and Soci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1983)一书的核心思想是:尽管中国

的社会主义消灭了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妇女,但它不可避免社会主义与父权制以新的方式结合起来。她称这种新的结合是“父权社会主义的农村秩序”(patriarchal-socialist rural order)。其他学者也有相似的说法。比如 Diamond 指出,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把过去属于家庭的土地和资源组合在一起,同时也把个体家庭中的男性联合起来,形成男性权威的集体化(1975, 378)。

过去认为,父权制产生于封建体制;当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后,父权制又与资本主义结合起来。而现在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也无法避免父权制对它的影响。

Judd 的《中国北方农村的性别与权力》(Gender and Power in Rural North China, 1994)一书强调国家与妇女的关系。该书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性别在农村社会中的中心地位以及这种地位在当代的变化;二,农村的权力关系包含了重新估价国家权力的本质,以及重建以性别为核心的权力关系(1994:241)。Judd 具体研究了改革开放后国家权力在地方政府权力结构中的运作以及对妇女的影响。她认为这种运作方式是,当国家政策引起了地方政治经济的重大变化时,国家让地方行政组织来具体实现这些变化。这些地方行政组织部分地依赖于性别等级制,而这种性别等级制完全建立在传统的中国政治模式的基础上。她因此认为,国家权力无所不在,渗透农村社会生活和社会性别关系的每一个领域和方面。

尽管我的研究范围和 Judd 很接近,但是我不能同意她的某些观点。根据她的看法,民间社会还没有出现,更没有生长壮大,也没有与国家制衡的能力。而“村”也不是一个国家和民间社会相遇和讨价还价的地点。这种看法使她忽略了农村妇女在发展中争取自己的空间的机会和能力。

村一级的权力结构——家族关系、行政领导、经济精英、家庭权威——是影响性别关系的关键因素。但同时,一个村社区的自立程度,即社区和国家权力的制衡对性别关系也有重要的影响。从社

会性别关系来讲,当地方权力被国家直接控制来达到提取更多剩余价值的目的,或者相反,当村社区获得了一定的自立,通过发展工业来推进本社区福利建设时,妇女在社区中的地位会有所不同,尽管权力结构的四个方面(家族关系、行政领导、经济精英、家庭权威)可能基本上没有变化。这当然并不说明性别等级制消失了,而是说妇女有了较大的空间向男人争取自己的利益,因为村社区本身已经有了和国家讨价还价的余地。

研究中国农村妇女问题一定要研究中国农民问题,也要研究国家问题。简要总结三点:一,中国的社会主义从建立之日起就是一个阶级社会,至少农民是一个明显的被剥夺的阶级。阶级的存在是社会主义不能消除性别不平等的关键性原因。第二,改革开放之后,民间社会逐渐出现。尽管还比较弱,但它给了农民一定程度的自治空间。乡镇企业的崛起就说明这种空间的存在和扩展。第三,不能把村一级的权力机构完全看成国家意志和政策的代理人,因为它和农民利益的一致性大于对国家意志的全面服从。同时,这种权力机构既是男性化的也是社区化的,社区利益也包括妇女的利益。

### 我的理论框架

受到上面所述四种理论的启发,并对这些理论有所评述后,我试图建构自己的理论框架,表述如下。

在中国,国家对妇女的直接的、巨大的影响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都不能比的。一个政策就会掀起一场社会运动,引起重要的社会变革。但妇女的困惑是,她们常常被置于国家和男人的不同利益之间,并被要求作出选择。例如,建国初期,国家号召妇女走出家门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不少男人希望女人在家看孩子做家务。50年代的新婚姻法男性农民反抗得很激烈,尤其反对离婚。因为媳妇是通过彩礼的形式花钱买来的,离了婚,媳妇没了,土改分的地女方还可以带走自己的那份,让这男人到哪儿再去弄彩礼,结第二次婚?



妇女并不总是夹在国家和男人中间。有时候，国家也会向男人让步，要求妇女作出牺牲。60年代困难时期，政府让吸纳不了的已就业妇女回家，并在报纸上说这是做“社会主义的家庭妇女”。“社会主义”这个标签并不能提高家庭妇女的地位，因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界限和其价值的不同是实际存在的。这个问题放在男人身上性质就清楚了。60年代也有很多男人失业，但政府不说让男人回家做“社会主义的家庭丈夫”，而是另想办法，否则事情一定会乱了套。还有一个例子：50年代就已经提出关于控制人口的问题，它的流产不是因为国家对此没有足够的认识，至少不是主要的因素，而是因为既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积累模式使然。大量使用廉价劳动力是当时工业积累的重要来源；源源不断地补充廉价劳动力是持续获得积累的保证。农村是提供廉价劳动力的最大的基地。在农民已经被剥夺得很多的情况下，如果再限制农民生孩子，国家和农民的关系就更紧张了。城里人有退休金，农民有儿子，儿子就是农民老年的生活保障。妇女的牺牲在当时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到了不搞计划生育就要威胁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时，节育问题就成了“妇女问题”。其实这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男人问题”。当然男人女人都要儿子，但在农村做主的是男人和男人的家族，而直接承受压力的是妇女，她们承受了来自两方面的压力和责难——执行政策者和她们的男人。

国家制定的有关妇女的政策包含着对妇女解放的真诚用心，但这些政策也常常具有两面性。至少在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的政治运动、社会改造和意识形态斗争都是为了一个切实的目的：实现民族工业化，巩固新政权。在这种前提下，站在国家与男人之间的农村妇女有多大的空间和这两方对话呢？当这两方对妇女的要求不一致的时候，性别平等如何实现呢？妇女通过什么渠道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呢？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又使这一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站在国家与男人之间”这个视角，使我既能看到宏观层面的问题，比如国家工业积累模式和发展战略，又能看到微